

陝西醫藥誌叢書

中藥誌

陝西中藥誌編纂委員會

陕西医药志丛书

中 药 志

陕西中药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中药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雷继文		
副主任	杨子建	林正武	刘铭庆
	曹修禹	李世全	贾林征
委员	刘录元	赵石麟	冯敬群
	郭生楨	周继乾	魏智民
	王仲东	张海发	韩宗儒
	熊德全	王银芳	徐显盛
	李生云		
顾问	杨伯华	胡正海	

陕 西 中 药 志

编 纂 陕西省药材公司编志办公室

杨 子 建 (负责)

韩 宗 儒

熊 德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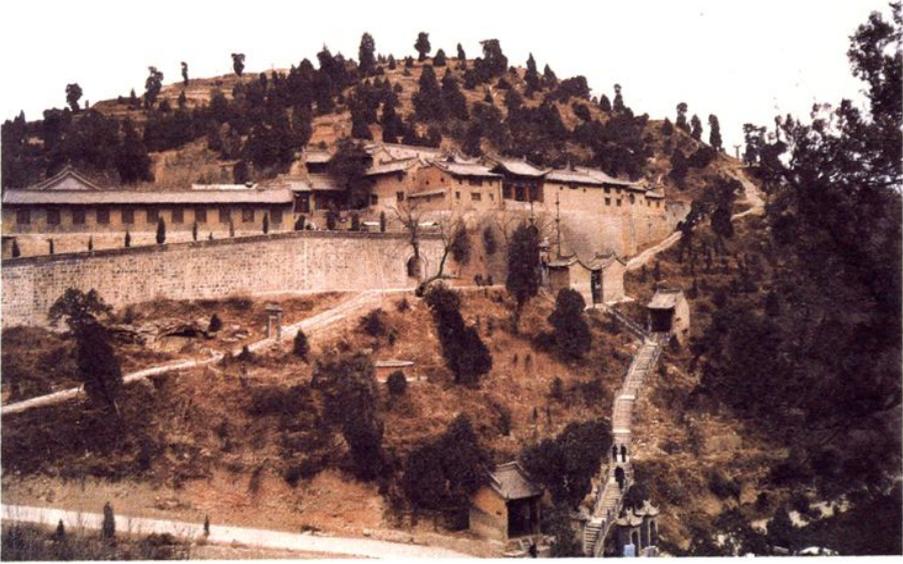
张 安 德

宋 清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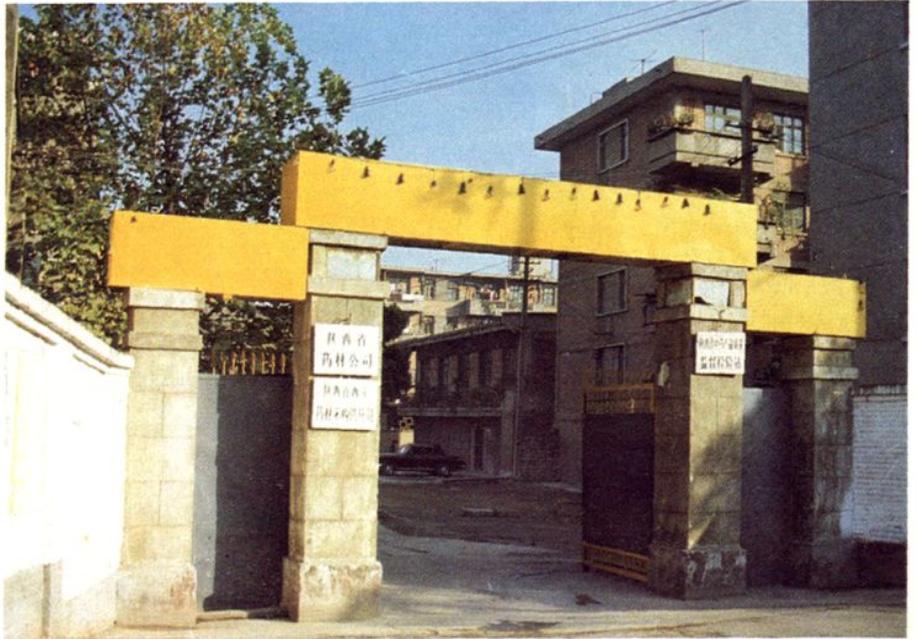
执 笔 杨 子 建

韩 宗 儒

张 菊 君



耀县药王山



陕西省药材公司



山茱萸

中成药部分
获奖产品



引种的西洋参
已在留坝等县
大面积生产

凡 例

一、断限：本志上限到炎黄时代，简介陕西中药之起源；下限到1988年末，个别事件到1989年，记述全省中药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二、体例：采用志体，横列中药门类，纵述发展过程。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先分大类，再分小类，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层层相辖，先后相因，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三、形式：本志采用志、记、图、表、传、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记为大事，图表相辅，附录为补。《大事记》历史部分从略，1955年陕西省药材公司成立后则逐年记列若干条，无确切月、日者，排在当年之末。

四、范围：以全省药材系统为主，兼及系统外卫生、科研、农林等部门之有关中药情况。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药史料简要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后的情况，则尽可能详述药材、饮片、中成药的产、购、销、调、存及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整个中药的发展过程。

五、资料：记载陕西中药的史料极为丰富，本志记述时按行文需要已多有出处，无出处的史料在注释中予以注明来源；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以省药材公司档案及各地市县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主，同时有各中药厂，中药科研单位等提供的资料及有关统计资料。

对有争议的人和事，则如实注明，为以后修志提供资料。

六、称谓：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时间称谓，按历史朝代纪年号，并注明公元年，未查出准确年月的，按朝代记述。机构称谓均按当时的名称纪述。

七、方法：本志除按志书方法记述外，还运用了统计分析法、历史资料对比法等现代科学方法，以期尽可能地达到揭示中药发展规律的目的。

目 录

概 述	1
大事记	9
第一章 中药起源与发展	23
第一节 起源	23
第二节 神农尝百草	23
第三节 发展概略	24
第二章 资源	32
第一节 资源普查	32
第二节 药源分布	35
第三节 大宗、地道药材	38
第四节 太白草药	38
第五节 华山药材	39
第六节 秦巴药物	40
第七节 草药的开发利用	41
第八节 资源保护	43
第三章 私营药业	45
第一节 古药店	45
第二节 集散市场	50
第三节 西安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	51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52
第一节 保健药社的设立	52
第二节 发展概况	53
第五章 建制沿革	57
第一节 中药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57

第二节	专业公司	58
第三节	现行体制	60
第六章	药材	62
第一节	生产种植	62
第二节	收购	73
第七章	饮片	79
第一节	加工方法	79
第二节	建国后的饮片生产	80
第三节	加工炮制工艺的继承与改进	80
第四节	凤翔县饮片厂	82
第八章	中成药	84
第一节	传统名牌产品	84
第二节	新兴的中成药工业	87
第三节	质量管理和技术改造	89
第四节	新剂型、新品种	92
第五节	产品名录	94
第六节	中成药出口	101
第七节	中成药厂	101
第九章	教育与中药科研	108
第一节	教育	108
第二节	科研机构	109
第三节	主要科研成果	111
第十章	经营管理	130
第一节	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	130
第二节	中药供应	134
第三节	物价管理	137
第四节	质量管理	140
第五节	财务管理	142
第六节	仓储及保管养护	145
第七节	市场整顿	146
第八节	企业管理	147
第十一章	人物	148
	参考文献及资料	157

附 录	158
一、康复路药材交易市场	158
二、渭南市振兴中药店	159
三、民国时期陕西省历年注册药商	160
四、陕西中草药名录	161
五、陕西省老药工名录	197
六、陕西省药材系统省级劳动模范名录	207
七、陕西省药材系统、中成药厂及中药研究所高级科技 人员名录	208
八、陕西省、地、市药材公司、中药厂历届领导人名录	209
九、中草药诗词，对联荟萃	228
十、陕西省中药材主要指标历年统计表	233
后 记	236

概 述

陕西位于我国内陆腹地，黄河中游，在东经 $105^{\circ}29'$ — $110^{\circ}15'$ ，北纬 $31^{\circ}42'$ — $39^{\circ}25'$ 之间，南北长约870公里，东西宽约200—500公里，面积20.6万平方公里。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跨越冷凉、温和与温热三个气候区。全省被秦岭和北山分为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区三个各具特色的自然区。构成有山有水有川、南北气候兼有的自然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材。根据中药普查发现3291味，尤其秦巴山区是物种起源的中心，在第四纪期受冰川影响较小，保存了一些古老的珍稀植物了遗种，被专家誉为“生物基因库”、“天然药库”。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地。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兰田猿人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有了人类的出现也就有了医疗活动，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发生在古陈仓(陕西宝鸡)境内的姜城堡蒙峪沟一带。医药之始祖炎帝、黄帝都曾在陕西活动过。

自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始，陕西的先民们在生活与生产中不断发现、认识、利用各种药物防病治病，并不断总结完善。

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在出土的陶罐内装有榛子、松子、朴树子等植物种子，这些在后世都是可作药用和食用的，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一定的医药知识。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奴隶社会的西周、封建社会的秦、西汉、东汉(末年)、新莽、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陕西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其间大夏王赫连勃勃建都在统万城(今靖边县长城外白城子)。作为全国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的中药商业活动随之兴起，特别是京城长安更是久盛不衰。

陕西历代中药名人辈出，医药著述甚丰，许多外省籍名医药家也来陕西从事医药活动，故在列国时秦医独盛，药业发达。春秋时代的医缓、医和，战国时的扁鹊，汉代的仓公、楼护，隋唐时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蔺道人、韦善俊、韦慈藏，宋代的石泰，明代的刘纯、杨珣、武之望，清代的叶蓬春……等，他们都在我国医药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群星灿烂，相互辉映。许多医药巨著也在陕西问世：隋代的《四海类聚方》、《诸病源候论》，唐代的《备急千

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宋代的《本草衍义》等，都是我国医药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对我国和当时的亚州医药学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陕西素有“秦地无闲草”之称，许多药材早已成为名品，华山的茯苓，白水的黄芪，大荔的沙苑子、麻黄，安康的厚朴、白胶香，陕北的甘草，彬县的地胆由唐时就列为贡品；长安的酸枣、麟游的柴胡等由宋时起都列为贡品，且从陶氏《名医别录》起以后历代本草著作早有著录。沙苑子、杜仲、甘草、山茱萸、党参等也都是畅销全国的地道药材。秦巴山区的草医草药是我国民间医药学中别具一格的一个重要流派，自唐以后逐渐形成的太白山草医药市场，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医药贩。

陕西有许多医药史迹：宝鸡姜城堡的神农祠、耀县的药王山、太白山的药王庙、洛南的韦公祠、汉中的天台山、陇县、南郑等县的“药王祠”等。

陕西现存的药方碑石较多，其中药王山存六通，是我国最大的一组药方碑群，陕西省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存四通。这些药方碑石是陕西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实物见证。

从古代的甲骨文，《诗经》、《山海经》到《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历代本草和医药典籍都记载了陕西产许多药物和陕西先民们的医疗实践。

宝鸡益门出土的西周早期的中药朱砂和炉甘石，可将我国炼丹术的历史追溯到周代以前。

1987年在韩城东汉墓中出土的薄荷、薏苡仁和枣核等中药，把我国薄荷的药用历史由唐代追溯到东汉时期。

不仅如此，从户县出土的汉代铁药臼，是由石器、骨器、青铜器工具发展而来的捣药专用工具。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造纸的发明，加速了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提高，人们的医疗实践和用药知识也更加丰富。人们开始种植药物。秦时在“上林苑”种植有上百种药材，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书”时明令医药卜筮、农作之书除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药史料。

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并最先开始了我国同异域的药物交流。

汉代还设有“本草待诏”官职，可以推断在此以前就已有本草著作了。司马迁（陕西韩城人）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已有学医、授药和“药论”的记载。更重要的是这时的医药学家总结了前人的用药经验辑录成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载药365种。按用药功能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养命，中品养性，下品治病。《神农本草经》开历代本草学之先河，对中药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隋代开始设置太医署，作为全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机关，除了设有行政人员外，还设有医

药学的教学人员，并已有了专门研究野生药材种植的著作《入林采药法》、《种植药法》等^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经济繁荣时期，京城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水陆交通发达，为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唐六典》记载，唐与当时的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医药方面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国药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中药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然后影响到欧洲。中国医药成为亚州医药的中心，对周围各国有很大影响。日本、朝鲜、埃及等国纷纷派学者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唐政府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礼宾院。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蕃客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格之高下。”另外市内还有外国商人开设的邸店、药行，进行药物贸易，也有印度的“胡僧”在街上摆摊行医。

唐代医药教育制度有了更大发展，且将医药分成两个部分，高祖武德七年（624）在京城长安建立了药学专校，当时称为药园，辟地300亩，种植药材800余种，可谓名符其实的专业药用植物园，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学教育机构。教学内容有栽培、采集、鉴别、炮炙等。

唐代统治者曾数次颁布医方，令各郡各县的行政长官将《开元广济方》择要写在大板上，公布于村镇要道处以广为宣传，这是我国医药卫生普及宣传的创始。唐玄宗时还曾诏令天下各州，要求把《本草》和《百一集验方》同经史一起保存下来，还发给百姓防病治病的药物，可见当时对医药卫生的重视。

唐代的民间药事活动也得到很大发展，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陕西耀县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撰著《备急千金要方》后又写成《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是集唐以前医药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唐太宗有《赐华原隐士孙思邈颂》诗：“凿开径路，名冠太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②。

唐《新修本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它成书于唐显庆四年（659）的京城长安，比西方纽伦堡药典早883年。

此外，孟洗的《食疗本草》（孟曾任同州即今大荔刺史），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陈曾任三原县尉），学术造诣甚高，影响颇深。

西安及关中各地出土文物中不仅有乳石、朱砂、琥珀、紫石英、珊瑚等名贵药材，还有盛名贵中药的金银器皿和用玛瑙制作的盒、罐、鼎、碗、钵、坛等。其上多有唐人墨书题字，注明药物名称、品级、数量等。说明唐代确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陕西药业日盛，各府、州、县志及许多药学专著都大量记录了当地所产药物及形态、功能、主治等。私营药业也日趋发达，在长安东西两市21行中，药行是其中一个重要行业。著名卖药人宋清就在西市开店，柳宗元曾为其著书立传。

宋元明清时，陕西药业进一步发展，到清末民初之际，大小药店遍布城乡，既经营生药

饮片，又经营熟药丸散。不少药商大量雇工专事药材种植，安康即有私人药山，凤县种植的“凤党”和平利、镇平一带种植的“八仙党”量多质优，驰誉全国及东南亚一带。在本草著作上则有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学术成就很高。

自唐以来，陕西各地逐渐形成一大批著名古药店，历代相传。唐时西安的万全堂，金元时户县的谢家店，明代西安的藻露堂、榆林的保元堂和积善堂、泾阳的万灵堂，明末清初富平的恒心堂、汉中的公兴大，清末民初宝鸡的诚顺和、临潼的福寿堂等。这些古药店及各地许多药店大都设有坐堂医生应诊，还备有方剂、汤头谱等，问病查方抓药，方便患者，也是善经营之道。这些中药行店大都是前店后场，以师带徒，子承父业，秘方传授，制售成药。户县谢家店的脚鱼归脾丸、周至广育堂的痧药、兴平的红杏核眼药、富平恒心堂的妙济丹，泾阳大寺的狗皮膏药、西安藻露堂的培坤丸、临潼福寿堂的灵宝丹等都享有盛誉。店因药而名，药因店而灵。

中药生产分散，在长期的经营发展中，逐渐形成大小不同的中药集散市场。西安市场早已驰誉全国，三原、虢镇在西北亦名噪一时。此外太白、华岳庙等也有一定影响。而安康、汉中、商洛是陕西药材主产地，也是陕西药材集散地，历来依靠汉江和丹江水运，经汉口转销各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交通阻塞，运销困难，我省一些家种药材如黄连、党参等急剧下降。同时，由于工厂内迁，西安、宝鸡等大中城市人口激增，货源紧缺，药价猛涨，大量游资投向中药经营，使中药行业一度出现畸型繁荣。西安东关药材行、店林立，药商云集，庄客遍布上海、汉口、天津、重庆等地。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解决军民医疗用药困难，边区政府根据边区中药资源丰富这一具体情况，建立和发展了防治结合、医药并举、民营公助的医药机构——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保健药社不断发展，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统治时期，采取扼杀中医中药政策，引起中医药界请愿反抗。陕西中药业遭到破坏，加之战争、交通等原因，不少药店纷纷破产，如安康有影响的几家药店于1945年先后倒闭，到1947年10月，西安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所属130多家中药店铺，业务凋零，大部分仅能维持伙食。各地药材种植亦相继衰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瘟疫横行，民国21年（1932）全省各地“虎烈拉”（霍乱）流行，死人无数，许多城镇一时间棺木售之一空，多数死者以席殓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中药，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措施。1955年以后，省、地、县各级药材公司相继成立。随着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

药业逐步实现了农、工、商一体，产、购、销结合的管理体制，陕西中药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各地陆续开展了中药资源普查，为发展药材生产和中成药工业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省、地、县药材公司建立了相应的生产机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1959年省药材公司首先在平利县的千家坪、白河县的五峰山、宁陕县的柴家关，略阳县的塔坡寺，镇巴县的黄柏林等地办起了五个国营药材种植场，随后，各地陆续建立了许多集体性质的社、队药场，大力开展引种试种，野变家种家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65年全省家种药材由1957年的14种增加到29种，种植面积由1957年的8000亩增加到5.3万亩，易地引种的元胡、菊花、浙贝母、白术、川芎等均获成功。1966年在镇坪、岚皋、平利试验推广林间栽黄连并创造了条形梯地栽连技术。但是，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陕西中药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产、购、销、财务等管理曾出现自流状态。不少地方把种植、采集药材当作“搞资本主义”“小生产自发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有些地方甚至农民采挖药材被批判、正当收入被没收、罚款，以致许多药材集体不能采集、种植，个人也不敢采集种植，药材收购量减少，供应紧缺品种增多，群众“抓药难”。但是，由于党和政府对中药工作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和政策，纠正了“文革”动乱的影响。加之药材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特别是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努力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大抓药材生产、收购和服务质量，使我省中药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并在各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1969年9月，陕西省卫生局、省药材公司在临潼召开了全省药材生产、收购工作会议，并提出县县办饮片加工厂的意见。此后，全省各地大抓药材生产，办起了更多的社队药场达4207个，到1978年，全省种药面积33.9万亩。各地先后引种试种药材20余种，野变家种家养近20种，同时，各地普遍开展了中草药普查和开发利用工作，特别是配合医疗卫生工作，开发中草药用于计划生育，治疗慢性气管炎等常见病、多发病，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改变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取得了显著成效。

1979年以后，随着农业经济责任制的推行，药材生产出现了较大变化，药材种植场解体或被社员个人承包，千家万户种药，出现了许多种药专业户、重点户。到1988年，家种药材70种，总面积达94.8万亩，较1957年增长117.5倍，比1978年增长0.8倍。但生产计划失控，存在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现象。

药材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收购，保证了市场供应和疫情用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后，陆续有计划地开展药材收购，到1957年产地药材公司直接设点或委托供销社对国务院规定的甘草、大黄、杜仲等38种药材实行有计划的收购。1958年后，私营药商及游医药贩被取缔，中药材逐渐形成由药材公司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的局面。到1988年全省药材收购达11580万元，纯销售10349万元，分别比药材公司成立初期的1956年的806万元和960万元增长13.3倍和

9.8倍。

丰富的中药资源，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陕西中成药工业的兴起。1956年1月，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西安国药制药厂，此后，汉中、宝鸡、安康、渭南、延安、榆林、商洛先后成立了中药厂，西安市有五个区办中药厂，同时还有秦岭、永寿、麟游等数十家县办药厂。到1988年，各地、市药厂和西安五个区办药厂生产中成药即达285种，年产量达2823吨，产值5731万元，复方羊红膂片、平消片、乳康片、天麻片等十余种产品先后被评为部、省优产品。陕西中成药工业已由小到大，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同时，各医院中药制剂室还根据医疗需要，自制了数十种中成药。

中药饮片的加工炮制，也由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县县有饮片加工厂，加工炮制逐步规范化。凤翔县饮片加工厂是我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受到商业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及中国药材公司的多次表彰。

陕西中药专业教育、职工教育和科研机构亦有很大发展，中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问题有所缓解，中药科研工作也取得显著成就。1958年在镇坪县建立了人工养麝试验场，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从1982年起又开展了家庭养麝。牛体培育牛黄和用B型超声波仪器普查天然牛黄成功，后者还获1987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牛体培育牛黄高产稳产技术研究获1989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从国外引进的水飞蓟、西洋参成功并已大面积生产。人工养蝎、养鳖、活熊取胆汁等均获成功。天麻野变家种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先后获省科技成果奖和国家发明二等奖，陕西天麻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一半以上。一些地、县公司还大搞群众性的科研试验工作，研制成功饮片加工炮制工艺流程及设备、电子抓药机、中药喷雾干燥技术，近年来又陆续采用微机等现代管理手段。据统计，全省已取得中药科技成果40余项。同时，有关中药学术著作亦先后在各出版社出版数十种之多如《中药研究文献摘要》、《陕西中药志》（第一册）、《陕西中草药》、《中药真伪鉴别》等。

建国后陕西中药外事活动不断，1979年由沙西·蓬耶拉尊率领的泰国9人药用植物考察团来陕对黄芪、杜仲、当归的栽培进行了现场考察。1983年，日本第四次生药研究者访华团来陕进行学术交流，考察了陇县大黄生产基地。1986年，陕西省药材公司派员参加国家医药局赴日考察团去日本访问考察。同时中药进出口贸易也有较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省各级药材公司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不断改革内部机制，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84年10月以来，在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陕西中药业出现了新的格局，产购销统一经营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多成分、多渠道、国营、集体、个体竞争的局面，长期被取缔的私营药业再度兴起，康复路药材交易市场已闻名全国，成为十大药市之一（见附录），除杜仲、甘草、厚朴、麝香外，其它品种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据西安市1986年统计，西安市药材系统外购销比重分别占全市的32%和28%，仅康复路药材市场月购销额即达150—180万元。

1986年，国务院提出“中药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后，全省各级药材公司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如西安市药材公司同重庆、沈阳、武汉、广州、成都、烟台等13个药材经营单位建立了大中城市中药贸易联合会，宝鸡市医药工商企业联合成立了宝鸡市医药集团等）；各级药材公司、各中药厂、中药科研单位都更加重视人才培养，中药专业教育和职工教育有较大发展，职工队伍素质得到提高，全省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达1500余人，中药后继乏人问题有所缓解；各中药生产经营、科研单位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和制度，饮片、中成药质量普遍提高；同时，结合市场情况，建立了信息网络，及时调整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大力解决紧缺品种的供应，各中药厂也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科研、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都取得多项成果并获部、省级奖励；在多方努力下，中药工作得到较快发展。1988年，中药市场过热，价格居高不下，全省购销分别完成17596万元和17635万元，实现利润2537万元，达历史最高水平，分别比1956年增长19.4倍、15.9倍和7.1倍，较1978年增长2倍、1.7倍和13.2倍。供应的紧缺品种由1985年的45种减为40种，是历史上最少时期，对国务院和省政府要求解决的15种紧缺药材除细辛、甘遂属多年生野变家种已安排生产外，其它已基本满足省内供应，成方率达96%，群众买药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中药饮片质量合格率已由1986年前的79.18%提高到90.96%。省内13家中药厂生产成品一次合格率片剂达92.63%，水丸81.7%，蜜丸86.29%，冲剂97.11%。优级品率片剂达80.63%，水丸57%，蜜丸47.97%。对13家饮片厂进行了重点技术改造，列入了全省技改计划，三年来有14个项目列入计划，总投资1263.8万元。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药大见成效的目标基本实现。

此外，渭南、宝鸡等地工商业联合会还在当地开设了中药店，对继承和发展中药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群众好评。

但是，各级药材公司成立以来，陕西中药工作在生产、收购、经营和管理上都曾出现过较大失误。生产上大起大落，出现了“多了砍，少了赶”，收购上群众批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萝卜慢了要剥皮”；经营中盲目购进，积压报损；基础管理工作差，各种事故、损失时有发生……等，都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近几年，中药工作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出现了企业活力增强，生产发展加快，购销经营活跃，紧缺品种减少的好形势。但宏观管理失控，百业经药，多方插手批发，倒买倒卖，流通环节增多；部分药材价格上下波动过大，致使一些药材生产盲目性很大，时多时少；购销中不正之风严重；林木和野生药材资源破坏严重；市场上伪劣、假冒药品不断等，严重危害中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198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和整顿流通秩序的精神，印发了陕政发(1989)60号“关于整顿医药市场的报告的通知”，省医药局、